



【书里书外】

## 活成这世界的一剂偏方

□钟倩

2009年,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对《收获》爱不释手。每期黄永玉的长篇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篇幅长,却颇有趣,一个老顽童的形象呼之欲出。然而,看了一段时间后,我有些厌倦,心里泛起嘀咕,什么时候才能连载结束啊?后来再看,直接翻翻略过。没想到这一连载就是十多年,我在文学殿堂里跌跌撞撞,摸到一丁点儿门道时,再读连载,陡生敬畏心。直到把作者和沈从文的关系理顺,我才真正知道了他是谁。老先生哪里知道,当年那个读连载的小姑娘,在他离开后,费尽周折把那摞泛黄的杂志从床底下扒了出来,搞得灰头土脸,重温“无愁河汉子”的童年与青春,就像回溯我与家乡护城河的“城南往事”。看着看着竟泪眼模糊,一时间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读他的作品。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是纪念那些比他老的老友,钱锺书、张乐平、李可染、张伯驹、林风眠、沈从文、聂绀弩、黄裳、黄苗子、郁风夫妇等。回顾与他们的交往和故事,在碎片式场景和历史性追溯中定格真挚的情感、艰难的生存和岁月的悲欢。看似是记录别人的故事,其实也是他的断代史和心灵史——心酸的、流泪的、惆怅的,闪着人性光芒的青春印记。最近刚出版的“姊妹篇”随笔集《还有谁谁谁》,这两本书可视作黄永玉最后的告别。他在序言《好奇与偏方》中说道:“我家乡那地方尽出怪事,由不得生下的孩子好奇天分很高。”好奇心是文学的敲门砖。邮局送信的倪揠揠,被花筒炸碎膝盖,乡人苗老汉命人找来当年的柳树干,备下没闹过的公鸡,用土办法给他把膝盖复原了,他又去送信了。好奇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黄永玉好奇的天性始终没变,所以在他的艺术之路上惊喜不断。

读完这两本书,跟随作者的视角感受艺术名家的患难心路和为人之道,我顿悟:黄永玉和他笔下老友们的活法,不正是疗愈浮躁尘世的一剂偏方吗?是地理的、人文的,也是精神的、灵魂的。有趣的灵魂就是这个世界的丹青和中药,独家配方,久传不衰。如果说有什么副作用,那就是让人死心塌地爱上自由,剪断翅膀或中途折翼,都无法改掉其天性。怪不得他强调说:“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回忆黄苗子时,他又说:“那一帮的先行者,今天已进入老年,可算是历尽艰辛委屈。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捏不起来。有谁记得他们才是新艺术最实际、最得力的开拓者呢?”老去的是故事,先行者永远年轻,因为他们的精神永远鲜活,一如被风抽打的杨树叶子,“哗啦啦”作响,像在热烈鼓掌。

读黄永玉就是读历史的箴言书,就是读生命的忏悔册。社会动荡、时代变革、战乱困厄,他只有一句“门票太贵”。是啊,那是押注性命的残酷考验和生死闯关。庆幸的是他手里的笔没有停,刀刻、漫画没有停,那是他的子弹和食粮。他回忆李可染拜师齐白石,请教艺术的精髓“笔法三味”。齐白石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这与当年沈从文对汪曾祺的教诲异曲同工。年轻的汪曾祺找不到工作,与家人在战火中离散,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恩师沈从文回信说:“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笔,一匹自由的骑乘,一个生命的支点。在艺术的殿堂里,绘画、音乐、写作共同之处在于走向更辽阔的孤独。提到陆志痒,黄永

玉评价他是个流落他乡的孤独的少数民族:“画家其实是少数民族,独特的脾气、思维法则、生活与宗教习惯、工作方式。从来为人另眼相看。”痛定思痛,当下的艺术家有多少孤独者?不是孤独得不够,而是相当一部分人太喜欢入伙或合群了。有一段话令我醍醐灌顶,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作品,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精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书中两处细节令我记忆深刻。当年黄苗子、郁风夫妇居住在北京东单观音寺,黄永玉经常跑去借书。“他们有许多好书和画册,毫不迟疑地任我借走,还了借,借了还。我们见面,百分之百的画和书的趣味。世界可爱极了。”所谓“画和书的趣味”,乃是最高级的趣味,也是一味中药,疗愈满身伤痕。无独有偶,漫画家黄苗子劫难归来,听闻黄永玉要重刻一套《水浒传》人物,立马拿出自己真藏的宋朝笔记卡片供他参考,“借来的卡片认真抄了,也恭敬地奉还了,多谢了。木板刻两百块也备齐了,自己也学着读一些宋人史料。后来木板给人搬光……”谁能想到,他迎来至暗时刻,黄苗子的慷慨大义却使他终生难忘,消弭了心底的痛楚。“我这种在江湖长大的人不容气馁,恚气的事从不过夜!”由此,我读懂了黄永玉这个“偏方”的力道和后劲,精神的枝桠野蛮生长,根柢在于敦厚善良和百折不挠的心。

《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从文表叔》,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极品之一。没有一味的赞颂和滥情,没有刻板的追忆和记叙,黄永玉以故事阐述故事,用人性烛照人性——弟弟、妹妹遭遇磨难,沈从文从未提及半字,黄永玉以“见证人”呈现出来,读来教人不禁落泪。青年时代,黄永玉有个忘年交曾当过土匪造枪铁匠,他请他锻造过一支鸟枪,为此烫红了手指,他继而想到从文表叔内心的创伤。“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写出的任何故事更富有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都不哼一声。”所有的认识,都是自我认识,抑或归于重新认识自己,如黄永玉的内心独白:“从文表叔和我的认识是扎扎实实用无数白天和黑夜的心跳、无数眼泪和汗水换来的,我们爱这个‘认识’!值得!不后悔!”他的那支金笔洞见人性,深掘灵魂的光芒。或许有人会说,他围绕的是那些照亮20世纪星空的大艺术家。其实不然。如果没有底层视角,很难如此深邃。他在《还有谁谁谁》一书里写到家事多年的阿姨曹玉茹。很多客人因没有见过她的笑容心生不解,谁能想到她是个有故事的人,饱尝过大苦难大悲恸。丈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双胞胎儿子被日军扔到河里,“阿姨当时回娘家,返家后一个人在潮白河边坐了三天”。苦难面前,每个人都殊途同归——黄家有难时,她挺身而出,被黄永玉妻子梅溪称作“家里的陀螺仪”。黄永玉善用留白,寥寥数语,就把她的一生烘托而出,“她懂得人生,她也笑,她笑得不浅薄,她有幽默的根底。”

黄永玉先生曾多次说道,“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第一,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第二,自己是个勤奋的人。”他用勤奋活成这个世界的一剂偏方。在我浅薄的认识里,像黄永玉和老友们这样的“偏方”实在太少,比如木心、王小波,比如孔孚。他们常读常新,一如簇新的柳条、清澈的泉水和啾啾的鸟鸣,帮助我们清洗伤口、疗愈心灵,获得孤独的勇往直前的力量。

□孙道荣

两个娃,在街头的公交站台相遇。一个娃穿着练舞服,看样子是从附近的某个舞蹈培训班走出;另一个娃穿的是校服,还背着个小书包。两个娃站在路边聊了几句。背书包的娃,将书包放下,校服也脱了,放在书包上面。两个娃面对面,开始比划起来。

我也在等公交车。等车的人不多。穿练舞服的孩子,先做一个动作,另一个娃跟着也做一个动作。你来我往。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就这样在公交站台,翩翩起舞。站台并不大,转个圈都略感困难。但两个女孩,跳得很认真。

我也没啥事啊。我就看着她俩,像看一场街头的即兴演出。我看出来了,穿练舞服的女孩,可能是刚学了一个舞蹈动作,而她要把这个新学来的动作,教给自己的好朋友。公交站台成了她们的临时舞台。她们的手臂在空中划过时,我感觉空气都开心得颤抖。不远处街头小公园里的花朵,也一定看到了这一幕,它们开得正艳,远远地做她们的舞台背景。

童年真好,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

有一次,我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一路上很孤单。车过南京站,上来一家三口,两个下铺是他们的。火车开动不久,小男孩就跟妈妈说,他要再练习一下。我躺在上铺,正无所事事呢,便好奇地向下张望,看他练习什么。小男孩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念起来。我听出来了,应该是一个学校活动的主持词。他念的内容,我真没听进去几句,好看的是小男孩严肃的表情:小脸憋得通红,一本正经的样子,很投入,仿佛这不是在火车上,他面对的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睡在上铺的一个陌生旅客,而是面对校长、老师和几百名同学。我憋住没让自己乐出来,这也或许伤了一个小男孩的自信心。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上台表演过。我有舞台恐惧症。舞台让我恐惧,聚光灯会让我不自在,摄影家和照相机的镜头,更是让我手足无措。当然,最难的,还是面对舞台下的几百只眼睛,我一定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害怕舞台,当然,我们大多也没有机会上过舞台。

但我们也一定有自己的舞台。我们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我们生性腼腆,在陌生人面前,往往连话都不好意思说。但村庄是我们的舞台,村口的池塘是我们的舞台,晒谷场是我们的舞台,老槐树的枝丫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在玩石子游戏时,是不会在乎大人的眼神的,甚至连最凶的生产队长的训斥,也吓不倒我们。女孩子们在玩踢毽子时,那动作的流畅和自如,一点也不比电视机里的女孩差。当某个池塘的水杯抽干了,全村的孩子们都赶来浑水摸鱼,池塘里的残水和烂泥,还有藏匿期间的鲇鱼什么的,瞬间就成了我们放纵的天堂。你看看,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是放得开的,也是快乐的。

每个人都是有舞台的。就像现在活泼的孩子们,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他们能随时随地翩翩起舞,自信,自由,自如。而我们的舞台是麦田,是工地,是车间,是操作台,是马路。这样看来,到处也是我们的舞台。

是的,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舞台。

【风过留痕】

到处都是童年的舞台